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庞德谦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书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作者:庞德谦编著

ISBN:7-224-07357-1/K825.81=341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定价:23元

《司马迁与 史记 研究年鉴》(2004年卷) 编委会

顾 问: 韩兆琦 张大可

主 任: 庞德谦

副主任: 赵 荣 梁建邦 党大恩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雅琴 韦爱萍 严安政 赵怀忠 赵 荣

庞德谦 党大恩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主 编: 庞德谦

副主编: 赵 荣 梁建邦 党大恩

序 言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郭沫若先生的诗篇，道出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人品、才华的赞扬，对其著作《史记》的高度评价。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作为司马迁的故里，这是陕西人民的骄傲；渭南的山水哺育了司马迁，这更是渭南人民的骄傲。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出身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曾担任太史令，并有编写一部史书的愿望。司马迁幼承父训，诵读古文经传。二十岁起，他进行了三次大的漫游，足迹遍历神州大地。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担任太史令，在太初元年（前104）主持了太初历的制定并开始著述《史记》。天汉二年（前99）遭遇了李陵之祸，司马迁隐忍苟活，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的写作，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史学方面，《史记》的产生是中国历史学的里程碑。它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从此纪传体成为我国史书的主要体裁。从《史记》到《清史稿》，共25部纪传体正史，4042卷，洋洋4500万言，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从不间断。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史记》的伟大贡献。

作为传记文学，《史记》刻画和塑造了数以百计的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历史人物典型形象，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之作，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里程碑。《史记》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长处，吸收了抒情文学《诗经》、《楚辞》等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和汉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史记》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就散文而言，《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等，都高举学习《史记》的大旗，把《史记》视为古文典范。中国的古典小说与《史记》有不解之缘，小说的许多题材都是《史记》提供的，《史记》是小说的土壤和武库。《史记》的审美观念、艺术手法也对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他文学样式如戏剧、诗歌、辞赋以及抒情文学等都与《史

记》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史记》的内容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经济、法律、文学、农学、医学、天文学、军事、宗教、建筑、地理等各个领域，包罗万象，各有建树，博大精深。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史记》也对中国文化的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第一，《史记》第一个建立了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这个概念。司马迁曾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不但接受了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而且将这种思想体现到历史编撰之中。据《五帝本纪》记载，颡顛、帝啻、尧、舜无不出自黄帝。据“年表”、“世家”记载，夏、殷、周三代君主，列国世家（包括吴、越、楚、匈奴等在内），无不源于黄帝。司马迁提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自称，对实现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第二，《史记》具有不朽的民族精神。《史记》借历史人物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和精神。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团结，奋斗，拼搏；坚忍不拔，战胜挫折；勇于改革，敢于革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等等，这种民族精神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阅读《史记》，我们眼前会浮现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经历非凡的传奇人物，我们为之震撼，顿生钦佩之情；我们为之动容，倍感痛快淋漓；我们因之激发，理想、奋斗更加坚定。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形象，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也为世人树立了一种精神榜样。因为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体现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体现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体现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正如韩兆琦先生在《史记评议赏析》中所说：“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它不仅仅激发人们对悲剧英雄人物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召唤人们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像他们那样，为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韩先生的评析，精彩而透彻地道出了《史记》所表现的这种不朽的民族精神。

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一直是中外文化研究者的不了“情结”。从汉代到现在，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学者成百累千，著作山积，学术组织不断出现，并且已经形成了一门学问——“史记学”。

渭南是司马迁的故里，渭南师范学院是渭南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宣传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我们责无旁贷。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研究司马迁与《史记》，早在1991年，我们学校就开设了“史记研究”选修课，1995年1月，我们学校又成立了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室，挂靠中文系，依托我院中文系、历史系教师以及全院司马迁和《史记》爱好者开展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研究室同志以司马迁和《史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于从家世、生平、思想、世袭等不同角度开展对司马迁的研究，从史学、文学、礼俗、军事、经济、政治、版本、文字、语言、体例、史记学、地方文化等许多方面开展对《史记》的研究。先后获得了10多项学院及省厅级有关司马迁《史记》的科研立项，编写了《史记人物大辞典》，出版了《史记人生百态》、《史记论稿》、《史记研究论文集》等三部《史记》研

究著作，编印了《史记研究通讯》，发表了60多篇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学术论文，成功举办过一次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年会，协办了两次司马迁和《史记》学术研讨会议，还举办了近10次《史记》研究学术论文报告会，《渭南师范学院学报》还特意开辟了“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专栏。这一切，已经将韩城、渭南、西安连成了一个《史记》研究的文化长廊，为宣传、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做出了一定成绩，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提高我们学院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水平，更好地组织广大教师开展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加大对研究队伍的培养，2005年，我们学院在原“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室”的基础上，批准成立了“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并且决定由史记研究所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旨在展示海内外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一年之中司马迁和《史记》研究概况，记录和整理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资料，扩大我们学院与海内外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组织和学者的密切联系，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而为宣传和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做出贡献。我觉得要编辑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把握好定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既然是年鉴，就要注意到年鉴的特点，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要符合年鉴的要求，要客观记录一年内司马迁和《史记》研究领域的大事，反映研究概况，使人们通过年鉴能对一年的研究情况有大体的准确的了解。二、设置好几个固定栏目内容。作为年鉴，要有自己的几个固定内容。比方说，要有年度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览观、年度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年度《史记》研究论文目录、年度《史记》研究动态、年度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著及论文集介绍、年度司马迁与《史记》重要论文摘要、年度有关《史记》考古发现、年度《史记》版本整理与研究概况以及海外研究动态等。另外，还应该注意整理和记录一些其他的研究资料。三、要注意提高学术品位。为了保证学术品位，要不断提高编辑把握全局、了解研究学术动态、发现和认识研究成果的能力。特别是要注意发现和总结学术界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对其中一些公开发表过的个别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原文附录，以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四、客观如实记载。年鉴的内容要尽量做到客观实际，重在客观记载，尽量避免发表评论，特别是要杜绝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五、建立好信息网。编好年鉴，一定要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网络，特别是建立海外的信息网络，把海内外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各学术团体、学者联系起来，互通有无，及时了解有关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以便使年鉴的内容越来越充实和全面。

以上所言，姑且作为这本《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序言。

目 录

序言.....	庞德谦 (1)
研究综述	
研究览观	(1)
研究动态	(18)
1. 《史记研究集成》出版	(18)
2. 《史记》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召开	(18)
3. “史记学”理论的建构	(18)
4. 《史记论丛》(第一集)出版	(19)
5. 《司马迁与 史记 论集》(第六辑)出版	(19)
6. 积极筹备司马迁诞辰 2150 周年司马迁和《史记》学术研讨会	(19)
7. 电视连续剧《汉武帝》引起《史记》热	(19)
考古与版本整理	
考古发现	(21)
版本整理与文献研究	(26)
论著与论文	
研究专著与论文集	(29)
部分论文摘要	(35)
研究生有关司马迁与《史记》毕业论文篇目选录 (1992 年—2004 年)	(43)
海外研究	
《史记》在韩国的流传及影响.....	(47)
日本研究论著与论文	(56)
学术组织与专家	
学术组织介绍	(57)
中国史记研究会	(57)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60)
韩城市司马迁学会.....	(63)
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室	(64)

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室	(64)
中国司马迁研究网	(65)
《史记》研究专家介绍	(66)
可永雪教授	(66)
宋嗣廉教授	(66)
韩兆琦教授	(67)
杨燕起教授	(69)
张大可教授	(70)
研究栏目与丛书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介绍	(73)
论文索引	
有关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 (1994 年—2004 年)	(77)
有关《史记》研究论文目录 (1994 年—2004 年)	(102)
后记	(134)

研究综述

研究览观

2004年，在司马迁和《史记》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公开发表了大约280篇论文，中国史记研究会召开了“《史记》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史记研究集成》，共14卷，包含20部专著，中国史记研究会出版了《史记论丛》（第一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集》（第六集）。

2004年，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司马迁与华夏文明研究

2004年8月9日到14日，中国史记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了“《史记》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就司马迁和《史记》与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内容进行了研讨。2004年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周少川的《史记 民族精神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王炜民的《史记 与中华文明》、张新科的《史记 十表的共同主题——大一统》、梁建邦的《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等。

周少川的《史记 民族精神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民族精神说到底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它包括了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人生观、理想人格等。《史记》的贡献就在于反映了汉民族繁衍发展至汉代所逐步形成的文化传统，并且同时注入了西汉时期汉民族空前团结、繁荣兴旺的时代精神。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根据自己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认识，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选择、剪裁、提炼和组织材料，用

以寓褒贬，别嫌疑，明是非，总结反映当时逐步形成的民族思想文化价值和理想人格。并且认为《史记》民族精神的历史内涵包括大一统的观念、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整体至上的胸怀、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等。王炜民的《史记 与中华文明》文章，认为《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名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一。在史学史方面，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的通史，首创了纪传体的史书新体裁，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通史著作，具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又记载了古代中华文明的成果，它以创造文明的主体——人为中心记载历史，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历程；对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对大量科技方面的成果、对学术方面的进步、对古代教育的发展等作了记载，特别是保存了孔子创立私学较为详细的史料。又认为，《史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它确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创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树立了中国古代史学进步的历史观；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作，促进了古典小说、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张新科的《史记 十表的共同主题——大一统》文章说，仔细研读《史记》，我们可以发现，《史记》十表的内容虽然各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作者首先论述了《史记》十表的各自主题，然后从十表的历时性、阶段性、人物以及《史记》全书体例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等方面探讨《史记》的共同主题，并且认为司马迁是从历史的角

度，总结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找到了合理的文化源头。梁建邦的《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文章，主要从司马迁爱国思想的内涵的构成体系、司马迁及《史记》爱国思想的体现，以及对司马迁爱国思想的评价几个方面探讨了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认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司马迁思想的核心，为国家和君主效力是司马迁的人生追求，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力量源泉和归宿，颂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史记》的主旋律。

二、司马迁人生研究

2004年关于司马迁人生的研究文章，主要探讨了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司马迁的悲剧情怀、司马迁的功名心态、司马迁的综合素质、司马迁的好奇心理、司马迁的气质与文质、司马迁的生命意识、司马迁的死因等。其中有赵安启的《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刍议》，王双的《司马迁的功名心态简论》，王锦贵的《司马迁综合素质浅论》，李绍平、李安的《司马迁好奇探微》，高巨成的《司马迁死因新探》等。

赵安启的《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刍议》文章，从人生价值取向、挫折价值观、生死价值观三方面探讨了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认为司马迁的价值取向是立功扬名，司马迁以“无闻”死去为耻，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的三大追求，而“立德”、“立言”、“立名”的根本目的是“立名”。司马迁对人生逆境、挫折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逆境与顺境周而复始地转化，凭借人的理义和智慧是难以防止逆境出现的。关键是人遇到逆境、挫折后要奋起。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找到了一条适合知识分子战胜挫折和逆境的道路，即“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立说，用生命创造精神财富，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司马迁又认为，人应该珍视自己的生命，敢于面对死亡是勇敢的象征，但人不应该轻率地死，要看是否死得其所，是否死得有价值。王双的《司马迁的功名心态

简论》文章，从一心向功名、隐忍求功名、青史留功名三个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功名心态。认为在西汉雄伟昂扬的时代风气和人们普遍积极进取的功名心态的感动和激荡下，司马迁内心充满成就功业、扬名天下的渴望，最终走上了不计生死、不畏人言、以忍辱含愤的精神继续完成修史大业的道路。司马迁的功名心态随着生命进程的流动在不断发生变化，可谓一波三折，由最初幼稚简单的入仕为官，成就功业，到为官后受挫折后转向立言，再到生命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再度走上立言与立德统一起来的功名之路。王锦贵的《司马迁综合素质浅论》文章，认为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出现的一位极其罕见的文化巨人，他涉猎广博，几乎触及当时我国所有重要传统学科，无论是在史学、文学领域，还是在相关的科学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深谙农学、医学、天文学、算术四大科学，而且在地理学、建筑学、经济学等领域也有极其深入的研究。司马迁成才的个人因素有三条：系统的后天教育、特殊的个人经历，优越的工作环境。其治学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五个统一上：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广博与专深的统一，文采与求实的统一，逆境与事业的统一。李绍平、李安的《司马迁好奇探微》文章，认为好奇是司马迁写作的一个鲜明特征，其好奇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关注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奇人，即性格与事迹与众不同的历史人物；二是表现在大量的奇异细节上，这些细节既有历史事件中的具体情境以及人物的活动细节，又有虽游离于历史事件之外，但有助于说明人物性格的生活细节。好奇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神实质，也是其独具特色的写作倾向，是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关键，它体现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也包含着司马迁的情感寄托，是“发愤所为作”的表现。司马迁好奇的史学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将个人的活动与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方式，还提出历史写作中的虚构与想象问题，并将它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还在于它对人的精神的独到把握，这使得司马迁的人物列传具有一

种精神史的意义。高巨成的《司马迁死因新探》一文，认为司马迁非寿终正寝，属于非正常死亡。即：司马迁在完成《史记》的写作后，适逢巫蛊案起，为免除“再受辱”，而愤然离京，返回故里——夏阳，投黄河而死。

三、司马迁思想研究

2004年，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发表的文章也不少，有郎震的《司马迁的“一家言”之核心》、程郁的《司马迁史学思想试论》、张海英的《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浅析》、邓瑞全的《司马迁的“利”“义”取向简论》、唐群的《司马迁史记教育思想初探》、殷小燕的《司马迁注重人才治国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张天恩的《司马迁的王权制的思想》、宋嗣廉的《司马迁的法制理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碰撞》、康清莲的《司马迁之民族史观与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汪受宽的《司马迁西部开发的实践和思想》、刘彦彦的《论司马迁的天人观和德治思想》、刘宏伟的《司马迁的“节用观”初探》、沈传河的《史记·货殖列传思想价值通论》、严安政的《试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

郎震的《司马迁的“一家言”之核心》文章，认为承敝通变、《六艺》统纪、拾遗补艺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三个核心问题。承敝通变即继盛极而后之衰敝，变化、疏通以谋求贯通。《六艺》统纪即继承先正的事业，效法孔子，遵循《六艺》统纪来述史。拾遗补艺即司马迁对孔子所垂“《六艺》之统纪”的创新和发展。张海英的《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浅析》文章，认为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对人性趋利致富本性的肯定与提倡。二是肯定财富是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础，为合法致富商人“作传”，鼓励百姓从商致富。三是“善而导之”的自由经济思想，司马迁是中国经济史上主张自由放任的第一人。四是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思想。邓瑞全的《司马迁的“利”“义”取向简论》文章，认为司马迁对孔子“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的关于“利”、“义”的论述极有心得，提出了“以礼义防于利”的更为积极的观点。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特别是追求欲望的满足，但人又不能完全被欲望所支配。应该满足人的合理欲望，但欲望又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要调节平衡。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倾注满腔热情，不惜笔墨予以褒扬讴歌。《范雎蔡泽列传》中“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应该是司马迁“利”、“义”观的最高境界。唐群的《司马迁史记教育思想初探》文章，认为司马迁虽未表明他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但我们透过司马迁对历代人物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所理想的人格，即教育目的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为“君子”、“安人者”。在教育内容方面，司马迁一是主张兼容并蓄，兼采百家之长；二是否定汉儒独尊，主张儒士的人格独立；三是重视“六艺”，注重礼乐。在教育方法方面，司马迁一是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获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二是要处逆不忧，发愤磨练，加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三是重视身教与博采，主张教育的及时和有节。殷小燕的《司马迁注重人才治国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司马迁对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考察所总结出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治国之道，就是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强弱成败，关键在于人才，人才是治国兴国的根本。任用贤才国则兴盛治强，反之，任用奸佞国必衰败灭亡。司马迁积极肯定勇于变革的人才，有着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和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的选材、用人思想，其注重人才治国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张天恩的《司马迁的王权制的思想》文章，认为司马迁主张有德者治天下，认为“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又主张用法律来制约王权，要循法而治。老百姓有批评皇上的权利，大臣要敢于犯颜直谏以制约王权，对待暴君应该激烈反抗，直至推翻他的统治。宋嗣廉的《司马迁的法治理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碰撞》文章，认为在司马迁看来，《张释之列传》实录的张释之对汉文帝说的“法者，

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应该成为千古明训。基于这种理念，司马迁撰写了一群不同类型“守法不失大理”的执法官。而司马迁的“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治理想必然与君主专制的现实发生碰撞。司马迁通过为一系列“守法不失大理”的法官立传，借以宣扬自己的法治理想，突出法的权威，以抑制君主个人超越规范对法的干扰和破坏。司马迁的法治理想在与现实的痛苦碰撞中逐渐升华，形成了实现“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治理想的良方，那就是要有一个能“兼听”的明君及其所容忍的“为天下决平”的法吏。康清莲的《司马迁之民族史观与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文章，认为对于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司马迁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海内一统的局面非常向往，另一方面又认为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都是兄弟，他反对残杀和掠夺，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司马迁希望能“修德文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于汉武帝所发动的战争，除了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认为不得不打以外，其他的诸如打朝鲜、东越、南越，伐大宛，通西南夷等等，司马迁都持保留态度，希望尽可能避免流血和牺牲。汪受宽的《司马迁西部开发的实践和思想》的文章，首先分析了《史记》对汉代以前开发西部所作的记载，又从北逐匈奴、“凿空”西域、通西南夷三个方面分析司马迁对西汉前期开发西部的记载，最后又从鲜明的多元一统的国家观、西部地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安定是西部发展的基础，与匈奴的和亲或斗争都应以其对社会安定的影响做出判断、强调发展西部地区交通和边防的重要性、人才是西部开发的重要推动力五个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西部开发思想。刘宏伟的《司马迁的“节用观”初探》文章，认为《史记》反映出了批评“侈靡”、崇尚“节用”的进步意识，其节用观主要包括节用自然之物和民生之物、爱惜民力、反对劳民伤财、反对穷奢极欲和铺张浪费等内容，并且认为节用观是司马迁“德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司马迁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并且与其货殖求富的经济思想并不矛盾。沈

传河的《史记·货殖列传 思想价值通论》文章，认为司马迁《货殖列传》的思想与儒学是相异的，其主要思想倾向是重富利、重治生，本末并重。其具体表现，一是揭穿卫道者的道德面具，揭示其内在的富利之心；二是给予巨富者以政治意义上的关注与评价，将他们与王侯等而视之；三是将奸富亦列为一种致富方式，而没有从道学家的立场出发给予它应有的道义上的严厉排斥。文章还从重视经济、崇尚实力、关注民生等方面论述了《货殖列传》的价值。严安政的《试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司马迁在天人观方面有时是矛盾的，既有明确的君权神授思想，有时又有与其相反的说法。他不能完全否定天命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人感应”说已经被统治阶级普遍接受并推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不能看作是对当时主体思想的屈服或主动靠拢，而应看作是一种适应时代和历史需要的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其写作《史记》的三大目的和三大精神支柱之一，就是要探究天象（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启示人们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一点，在人们对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认识越来越清楚，人们对保护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巨大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的今天，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整个人类提出了一个几千年以后人们才普遍关注的关系到人类存亡和生存状态的重大课题，这是司马迁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四、《史记》写作艺术研究

对《史记》写作艺术的研究，一直是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热门课题。2004年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意见。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可永雪的《史记 写人文学论纲》、王鑫义的《史记“体圆用神”特点的领悟》、邹然的《史记 文笔刍议》、王守雪的《史记 文学法则的意义》、梁建

邦的《史记的讳饰修辞艺术》、马宝记的《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窦楷、任孝温的《史记对元杂剧影响浅探》、杨亚娟、吕蔚的《论史记叙事风格的反差修辞》、黎艳的《论史记人物传记的衬托艺术》、李巍的《论史记行文之“重沓”与艺术之形象》、方蕴华的《简论史记细节描写的多样性》、陈桐生、刘奕华的《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吗》等。

可永雪的《史记写人文学论纲》文章，认为用现代文学观念来认识和衡量，《史记》最大、最主要、占第一位的文学成就，实际上是在写人，在刻画和塑造人的形象方面。《史记》的写人成就，一方面是刻画塑造了一大批至今仍然活在人们心目当中，活在文学艺术天地里的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人物的形象；一方面是司马迁具有高超的刻画和塑造人物的艺术技巧。《史记》和东西方古代经典代表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体式的创造及其典范意义，二是重视细节描写和喜欢以轶事传神，三是写人写心，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史记》又有独自的艺术特色和优势：一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二是互见法的巧妙运用，三是人物语言的奇、异、精，四是传记作品的诗意化。王鑫义的《史记“体圆用神”特点的领悟》文章，首先解释了章学诚关于《史记》“体圆用神”的论断，然后从《史记》的撰述体例探讨其“体圆用神”的特点。认为《史记》虽然设置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但在实际应用时，有体而又不拘于体，灵活多变，围绕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服务。二者水乳交融，有机结合。这是《史记》“体圆用神”在体例运用上的突出表现。邹然的《史记文笔刍议》文章，认为《史记》之所以臻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崇高境界，是与司马迁史笔与文笔的巧妙融合、交互运用的写作方法密切相关的。其“史笔”是科学范畴，旨在考信去伪，直言录史，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文笔”是艺术范畴，旨在拟虚补罅，饰词运事，生动细腻地描写人物、叙述事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司马迁文史兼备

的卓越才华。《史记》的“文笔”，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曰猎奇述异，二曰夸张渲染，三曰拟话代言，四曰细节描写，五曰议论抒情。梁建邦的《史记的讳饰修辞艺术》文章，认为讳饰是一种对于不能直说或者不便直说的事情和话语，改用另外一种话语来加以回避掩盖或粉饰美化的修辞方法。司马迁的《史记》继承了先秦的讳饰习俗和讳饰修辞，保存了大量的讳饰实例，丰富并发展了讳饰修辞。《史记》的讳饰可以分为掩饰和美饰两类。其掩饰主要包括忌言名讳、忌言“死”、忌言疾病和忌言败绩等四种。其美饰是因为怕触犯忌讳，而改用其他词语来回避掩饰或装饰美化，重点在“美”，在“饰”。美饰同掩饰修辞相比，具有更明显的美饰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其运用的讳饰词语大多是因时因地不同而独自使用，没有什么规律可循。马宝记的《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文章，主要论述了《史记》讴歌英雄之死与赞颂贤者之死，认为《史记》通过对英雄和贤者之死的描写，表达了司马迁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充满着知识分子忧国伤时的期盼。窦楷、任孝温的《史记对元杂剧影响浅探》一文，认为《史记》对元杂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元杂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来源，在可稽的700多种元杂剧剧目中，题材来源于《史记》的有23种。二是为元杂剧提供了可资的情节结构。三是《史记》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如在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塑造方面，对元杂剧产生了影响。杨亚娟、吕蔚的《论史记叙事风格的反差修辞》文章，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了张与弛、刚与柔、虚与实、散与韵、异与同等一系列的反差修辞手法，将两种反差强烈的情调交叉使用，转换交错，使《史记》的叙事风格参差变化，曲尽其妙，更好地塑造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从而也更好地为他的“一家言”服务。黎艳的《论史记人物传记的衬托艺术》文章，认为《史记》在运用衬托手法来塑造人物方面是极为出色的，其衬托手法大致有以下五种，一是人物两相对照，相互衬托。二是虚实参用，以实托虚。三是以宾衬主，对

人物进行侧面烘托。四是引用歌诗，渲染气氛，烘托人物。五是大衬托下包含多层小衬托。司马迁运用衬托来写人物，就为人物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不需要作者主观介入进来，就能自行区分其高低优劣，使人物性格泾渭分明。但烘托毕竟是一种纯文学的手段，免不了虚构和想象，使《史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实。方蕴华的《简论史记细节描写的多样性》文章，认为《史记》的细节描写具有论断性、抒情性、奇特性和想象性，其细节描写的论断性表现为，一是暗合作者精辟独到的史识，二是为人物、事件的结局作伏笔，三是寄寓作者的褒贬之义。其细节描写的抒情性表现为，一是对英雄人物或悲剧人物的由衷的同情或赞赏，二是蕴含着一种深深的身世认同感。《史记》细节描写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其善于通过描写那些具有奇特性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使之更加鲜明生动。而与其细节描写的奇特性的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其想象性。《史记》的奇特性的细节，是司马迁在不违背历史真实，坚持以“实录”、“考信”为原则的前提下，从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中得到的，即使有想象性，甚至夸张性的细节描写，也是司马迁在基本情节符合历史的前提下，遵循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作了适当的想象推演而得来，绝非作者胡诌乱造。陈桐生、刘奕华的《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吗》认为，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人撰文说《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史记》的实际内容。实质上是将人物传记与纪传体二者混淆起来，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作用。

五、司马迁与《史记》的比较研究

2004年的司马迁与《史记》的比较研究，出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在司马迁与班固、《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方面。这主要得力于2002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咸阳召开的“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其主要论文有刘春华的《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研究》、孙海洋的《两汉文化与马班思想》、王子今的《司马迁、班固

生态观试比较》、刘华祝的《司马迁与班固的“义利观”之比较》、杜振虎的《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宋嗣廉的《从为仓公立传管窥马班文化同中之异》、李志慧的《马班之气质与文化探源》、美国学者倪豪士的《史记和汉书比较研究的状况》、蒋方的《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吉春的《班马命运浅识》、台湾学者李伟泰的《史、汉论赞异曲同工例》、杨昶、谭汉生的《马班在“本纪”“世家”上的差异试论》、李岭的《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之不同态度》、徐家骥的《史记汉书对中国古代医学的贡献简论》、荣新江的《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等，还有赵吉惠的《史记·论六家要旨文本解读与比较研究》、陈曦的《司马迁与孔子崇古意识之比较》、王记录的《史记和周易关系三论》、叶文举的《史记的人生观、夫妇观与周易》、张涛、宗静的《司马迁的史学与易学》、陈桐生的《不是六艺胜似六艺——谈史记与论语学术关系》等。

刘春华的《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研究》文章，主要论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民族认识水平、民族思想的异同及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等，认为班固时代比司马迁时代民族的区分更清晰，对少数民族特征、风俗习惯的认识，班固比司马迁更深入全面些，儒家关于民族的认识是司马迁和班固民族思想形成的共同理论基础，他们都宣扬民族一统，是其大一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迁强调华夏民族同祖，有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夷夏之辨”观并不强烈，班固则有明显的“夷夏之辨”思想，司马迁反对对少数民族武力征讨，主张实行怀柔羁縻政策，班固则主张在某种形式下采用武力征伐的手段对付四夷，但对那种纯粹为了开拓疆土而征服其他民族的战争却持反对态度。孙海洋的《两汉文化与马班思想》文章，认为汉代四百年间，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华夏文化也呈现统一发展的特征，但它又矛盾纷繁，派外有派，派内有支，相互争斗而又相互融合。这种矛盾统一也表现

在司马迁和班固身上。大体来说，在司马迁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中黄老道家的成分比较大，而社会思想、伦理思想、学术思想方面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二者虽然有矛盾，但却有机地统一在司马迁身上，统一在新道家这面旗帜下。班固的思想矛盾来自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影响。班固在哲学、政治思想等方面受今文经学影响较多，而在伦理道德、学术思想方面受古文经学影响较大。王子今的《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文章，认为在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方面，司马迁表露出积极的生态意识，主张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班固《汉书》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情况，但屡见“节用”一词，他的“节用”已经大多并非取于“地”的有关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关于灾异史的记录，司马迁是相当重视的，而班固的记载则不如司马迁完整。在关于灾异的理解方面，司马迁对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取审慎的态度，而班固对灾异的分析，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司马迁更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班固似乎更重视生态与民俗的关系。在关于生态保护方面，司马迁没有更多的关注，而班固的《汉书》则多涉及生态保护问题。刘华祝的《司马迁与班固的“义利观”之比较》文章，以《史记》和《汉书》的货殖传为中心，对司马迁和班固的“义利观”进行比较，认为司马迁主张“义”、“利”并重，肯定追求物欲是人的本性，但他在强调“富”、“利”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义”。实际上是将“义”与“利”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鼓励人们逐利求富，又反对为富不仁、为富不义。认为人们争“利”应当采取正当手段，也就是要符合“义”。在他看来，“义”与“利”是对等的，是统一的。而班固主张的是重“义”贱“利”。他强调等级制度，主张用礼法约束货殖，限制人们逐利求富的行为，对人们冲破封建礼法而追逐财富的情况十分愤慨，希望人们寡欲无争，并对管子倡导的“四民分工论”倍加推崇。形成司马迁和班固“义利观”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西汉前、中期社会上弥

漫着逐利求富之风，二是汉武帝以后人们的义利观有了转变，三是东汉时人们普遍重义轻利。杜振虎的《从史记 汉书 透视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文章，通过《史记》和《汉书》有关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的记载，探讨了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认为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特征，首先是高贵、骄奢、有失体统，他们在生活规格和设施上可以拟同天子，又好事淫乱，不遵循汉朝的仪法，不认真理朝视事，治理封国喜欢随心所欲，有怨则发或反，敢与国策抗衡，甚至亲骨肉之间互相倾轧。其次是有的诸侯王好经学，善文辞。第三是朝廷重大问题的处理，常常由诸侯王中的男性长辈出面。第四是具有军事特征，有的诸侯王曾因此为皇朝建功立业。形成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特征的主要原因，一是制度上的原因。郡国制的确立，统治者赋予刘姓诸侯王比较优厚的待遇和较大的权利。第二是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原因。汉初统治者认为骨肉同姓是“镇抚四海，承卫天子”的重要力量，分封非常必要，生活规格应优厚一些。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最高统治者往往姑息迁就，显得很软弱。第三是最高统治者教子不善的原因。第四是历史的局限性原因。宋嗣廉的《从为仓公立传管窥马班文化同中之异》文章，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在对待仓公这一人物历史地位认识、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第一，班固是将仓公坐罪当刑作为汉文帝下令废除肉刑的由头来写的，着眼点是文帝的“以德化民”。司马迁在彰显汉文帝的“德至盛”的同时，又把矛头对准了正在膨胀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诸侯”。第二，司马迁特别关注一向被轻视的行医者，单独为仓公立传。班固的《汉书》却没有让仓公入传。第三，司马迁对仓公的遭际感同身受，由此抨击了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官场中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现象。而班固则特别关注缙绅救父。写了《咏史》诗，寄寓了自身遭际的感慨和处境绝望的悲哀。李志慧的《马班之气质与文化探源》文章，认为就气质而言，司马迁著史既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又表其“文采”于后世，

既具有历史家之学，思想家之识，又有文学家之才。班固虽能“穷西都之首末”，然“穷刘氏之废兴”时守成有余，而开拓不足，史料详实而史识平浅，虽有两都之赋、《咏史》之诗，却被钟嵘讥为“质木无文”。就文质而言，《史记》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形象性完美地结合，融注着作者的深情和感慨。《汉书》史料详实，体例严密，不失为历史著作的典范，然其多数传记多平面叙述，少立体描写。造成司马迁、班固气质与文质不同的原因，首先是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即西汉与东汉不同的社会环境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其次是他们地域文化的特点和家族文化的传统不同。第三是与他们两人不同的社会经历密切相关。蒋方的《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文章，认为《汉书·司马相如传》是承继《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而来，但司马迁、班固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司马迁《史记》所载司马相如事迹有三：一是他仕于武帝前的经历，二是通西南夷，三是文赋创作与作品。其基点应该是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而班固则是把司马相如定位为西汉一代辞赋文章的领袖。其结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作文学家而载入史册的却是《汉书》的班固。李伟泰的《史、汉论赞异曲同工例》文章，通过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与《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与《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序》；《史记·平准书赞》与《汉书·食货志序赞》、《史记·货殖列传序》；《太史公自序》与《汉书·货殖传序》、《汉书叙传》；《史记·游侠列传序》、《太史公自序》与《汉书·游侠传序》、《汉书叙传》的比较研究，认为《史记》、《汉书》记事重复，论赞的议论不同，但却异曲同工，往往彼此各具匠心，同样值得重视和欣赏。司马迁在论赞中常有身世之感，多借题发挥之语，班固也不例外。班固是否一味“宣汉”，恐怕有商榷的余地。杨昶、谭汉生的《马班在“本纪”“世家”上的差异试论》文章，认为《史记》是通史，他的任务就是序历代帝王之兴衰。

项羽为秦汉之际的霸主，故司马迁特立了《项羽本纪》。而《汉书》是断代史，西汉以前的帝王都不立纪，因此不能强求《汉书》把项羽列入西汉帝王之侧。《史记》纵论古今，对各代所有的帝王不能一一详究，对那些历史上或材料不多或作用不大或王命短促的帝王可以从简，甚至可以略而不叙，这是由通史的巨制所决定的。《汉书》为断代史，设立《惠帝纪》无可非议。《汉书》将“世家”改为“传”，完全从体例上来反对班固把《陈涉世家》改为《陈胜传》是难以立足的。在如何评论陈胜这个历史人物的问题上，班固和司马迁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描绘的陈胜是一个亡秦首事、启汉大端的英雄形象。李岭的《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之不同态度》文章，认为司马迁对游侠采取肯定、赞扬的态度，而班固则采取否定贬斥的态度，其原因有二，一是与他们的个人身世及遭遇有关，一是与时代的风尚不同有关。司马迁的先祖世业史官，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有着悠远的史学家传。不凡的家世，无疑从小便影响了司马迁的志趣和抱负。父亲的遗嘱，又激发了司马迁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决心干一番伟大的事业。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感到了世态炎凉，人情淡漠，以更加顽强执著的精神投入到了《史记》的创作中。他在古今侠士身上发现了反抗现实压力的力量，找到了挣脱命运控制的突破口，通过游侠表达自己不甘做命运奴隶的心声，渴望和呼唤人间真情，于是便热情讴歌游侠精神。班固的家世代显赫，受宠显贵，使得班氏满门对刘汉王朝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拥护。班固因修史入狱，但得到了亲戚朋友的援救，并且被任命为兰台令史。这样的家世和比较一帆风顺的个人经历，使他一心一意为拥护刘汉王朝统治而尽己之能，这样便决定了他是不会对那些以武力犯禁的侠士进行歌颂的。从时代风尚看，汉初统治者自身就是游侠出身，或者与游侠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对侠士采取了宽容忍让的态度。在一般百姓心目中，也把游侠作为“英雄”推崇备至，这种自上而下的敬重游侠的风气势必会影响那个时代的每个臣民，包括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所处的东汉社

会情况则有所不同。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把“以武犯禁”的游侠视为一个动乱之因，加以限制，对游侠进行打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又极力维护汉室大一统的班固对游侠持贬斥批判的态度就不足为怪了。徐家骥的《史记 汉书 对中国古代医学的贡献简论》文章，主要论述了《史记》和《汉书》对中国古代医学的贡献，认为《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医家人数和传承关系，反映了先汉医学颇具规模，形成一定流派，并具有了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传承特色。《史记》和《汉书》还通过30多名医生的行医史实的记录，为后世保存了先秦、秦汉时期医学研究、治病实践及对人体生理结构、发病机理的认识。他们极大地弥补了现存中医典籍对自身早期历史记载的缺陷，留下了可贵的华章，对中医科学的传承发扬意义重大深远。赵吉惠的《史记·论六家要旨 文本解读与比较研究》的文章，主要从比较《史记·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入手，来解读《论六家要旨》，认为司马谈概括的“六家说”是符合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实际的。其两大贡献，一是对六家诸子学说，做出了比较准确的逻辑界定与概括，基本抓住了每家每派学说的思想核心与实质内容，为了解、认识中国思想问题提供了宏观、整体的理论框架，为两千年来中国学者所认同，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理论坐标。二是对六家学说采取了分析的方法，对每一家（道家除外）学说既肯定长处，又指出短处，从而建立了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科学方法，奠定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良好学风，对于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以上两点都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不及的。陈曦的《司马迁与孔子崇古意识之比较》文章，认为孔子和司马迁都有十分突出的崇古意识。孔子崇古主要是对夏、商、周三代明君贤相的礼赞和对西周礼乐文化制度的推崇。司马迁则崇尚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上古帝王，崇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大臣，崇尚伯夷、孔子、屈原等超越世俗的倜傥非常之人。他们的崇古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内核和意义上的不同。孔子崇古意识的内涵，

主要侧重于政治制度礼乐方面。司马迁崇古信仰的精髓体现在他充分吸纳先贤思想而又独具面目的道德、文化立场。孔子高举历史信仰的大旗，顺乎西周以来重人轻神的思想潮流，客观上冲淡了社会上宗教势力的色彩，奠定了儒家学说人文的而非宗教的思想特征。而司马迁崇古信仰的意义则在于使史学挣脱皇权政治的束缚，树立了一个追求史学独立品格的光辉典范，抵制了西汉以来盛行的媚附皇权的庸俗哲学。王记录的《史记和周易关系三论》文章，认为《史记》和《周易》的关系极其密切，司马迁父子两代人传杨易学，把“正《易传》”当作从事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司马迁对《周易》精髓有着精湛的研究和正确的体识。《周易》在认识自然、社会、历史时，最富有特色的观点是变化思想。司马迁即抓住了《周易》这一关键，他创作《史记》就是要“观变”，并且有着与《周易》共同关心的主题，即“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叶文举的《史记的人生观、夫妇观与周易》文章，认为司马迁深受《易》学影响，《史记》和《周易》在人生观和夫妇观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深打上了《易》学的思想烙印。在人生观方面，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自强不息的立功名于天下的思想；二是隐忍等待和抓住机遇的思想；三是君主为人要谦虚的思想；四是全身而退的处世哲学。在夫妇伦理观方面，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司马迁认为君主对婚姻问题应高度重视，它往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成败兴亡与自身的荣辱。妃匹应该修德，远离权力，若争势夺利，媚悦主人，小则丧身，大则乱国，夫妇之礼废带来的灾害是深重的。张涛、宗静的《司马迁与易学》文章，主要论述了司马迁家学传统中的易学渊源、易学与司马迁的著述宗旨及易学与司马迁的人生观和治学风格等三个方面问题，认为司马迁的易学出于其父司马谈，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孔子。他继承和发挥《易传》天人合一思想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同时吸收借鉴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沟通天人，“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的人生理想、人格风范对《易传》